

儿童小说创作探索录

周 晓 著



广东人民出版社

7.8

儿童小说创作探索录

周 晓著

*

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广东新华印刷厂印刷

737×1092毫米32开本 4.375印张 81,000字

1983年10月第1版 1983年10月第1次印刷

印数1—3,190册

书号10111·1400 定价0.39元

目 录

儿童文学札记二题·····	1
儿童文学创作要有大的突破·····	7
论辩品格、“左”的影响及其他·····	12
——再评赵耀堂、肖甦同志的评论	
“恩来同志和我们同在”·····	21
——中篇小说《雾都报童》读后致作者	
试论刘真短篇小说的思想与艺术·····	29
回顾与探讨·····	43
——关于三十年来的儿童中篇小说创作	
人物·故事·生活·····	64
——读儿童中篇小说《野妹子》、《高高的苗岭》札记	
儿童文学的报春燕·····	69
——一九八〇年以来儿童短篇小说创作管窥	
努力塑造新的美的少年形象·····	87
——评小说《勇气》、《新星女队一号》	
值得发展的创作特色·····	92
——读《“欢乐女神”的故事》断想	

起步与进展	96
——近年来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片谈	
读日本小说《窗边的阿彻》随想	113
——译本前言	
读儿童文学散文创作札记	118
——关于《童年时代的朋友》、《幼年》及其他	
冰心和她的《小桔灯》	124
为孩子们写一些纪实性作品	127
——兼谈一九八一年《少年文艺》发表的报告文学	
后记	182

儿童文学札记二题

粉碎“四人帮”以后，儿童文学从濒于消亡中复苏了。但不必讳言，三年多来的儿童文学创作看来主要是恢复，发展不够快。我们的文艺创作，近年来取得了使人鼓舞的突破与创新，其繁荣发展为建国以来所罕见。尽管有少数作品产生了某些不健康的倾向，但支流不可能掩盖主流，社会主义文艺毕竟是大踏步地前进了。而观之儿童文学，却不免给人以“僻处一隅”之感。为什么儿童文学创作迟迟未能取得显著的进展？原因究竟在哪里？很值得研究。谁要是庆幸于儿童文学作品未出现不良倾向，从而得出结论说，裹足不前是最稳妥、保险的良策，那就可悲了。

关于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

建国以来，一些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在一代少年儿童中曾经起过很大的教育作用。这些作品，作为“生活的教科书”，对广大少年儿童进行了社会主义思想品德的教育，培

养少年儿童在生活中辨别真伪、善恶和美丑的认识能力和审美能力。这些作品对于孩子们高尚品德情操的熏陶，革命人生观、世界观的形成，都有不容忽视的意义。可是，长期以来，在“左”倾思潮干扰下，“生活的教科书”逐渐被简单化为“政治教科书”，儿童文学创作中愈来愈严重地出现了如茅盾同志一九六一年所尖锐批评的现象：“政治挂了帅，艺术脱了班；故事公式化，人物概念化，文字干巴巴。”儿童文学创作中的这个问题，更甚于成人文学。

儿童文学创作中的“左”的倾向，诸如图解政策、配合任务之类，是过去许多年来儿童文学发展的主要障碍；然而，并不是儿童文学创作存在公式化概念化的全部症结。儿童文学创作中公式化概念化之所以比成人文学有过之而无不及，还因为在创作指导中，对于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理解太简单、太狭隘。这使得儿童文学的创作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而且与前述“左”的倾向互为表里，“相辅相承”；对儿童文学教育作用的狭隘要求，每每转化为对政治教育作用的更为狭隘的要求，致使公式化概念化愈演愈烈，积习难返。

为了促进儿童文学创作思想的解放，在儿童文学社会教育功能问题上，我主张打破戒律，认识上要尽量求其宽。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是重要的，尤其在经历了十年浩劫之后，对于青少年，医治内伤，塑造灵魂，强调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无疑更有其迫切性。我们不妨说：儿童文学，就是教育儿童的文学。但是，时至今日，我们决不能把儿童文学单纯作为达到某种思想教育目的的直接教具。过去，那种把作品的教

育意义和政治性等同起来的“左”的观点，已经窒息了儿童文学的创作生机；今天，我们如果把儿童文学的教育作用理解得过于直接、偏狭，仍然有导致忽视艺术规律和儿童文学作为文学的特点，回到“左”的老路上去的可能。

照我的理解，我们的儿童文学，应该通过孩子们喜闻乐见的形式，真实地描绘他们所能理解的生活，使他们在艺术的“潜移默化”中认识生活的真理，树立崇高的理想，培养美好的情操，从而健康地成长为社会主义的一代新人。当然，不应该把反映生活和强调教育这两者对立起来。不过，我以为在当前的儿童文学创作中，首先应该着重强调从生活出发，强调对生活的艺术表现；只有这样，才有可能促进儿童文学艺术生命的勃发。纵观儿童文学史，的确有不少作品写作时是有明确的思想教育目的的，其中不乏优秀的作品，大家熟知的老作家张天翼的《罗文应的故事》即是适例。可是，也有不少影响久远的儿童文学世界名作，并不是具体的教育目的的产物，而是生活的激情孕育的艺术之果。这样的作品，写作时很难说有具体的教育针对性，但由于所描绘的生活蕴蓄着生活的真理，因而富有宝贵的教育意义，这是人所共见的客观事实。儿童文学是文学，其社会教育功能之广泛深入的发挥乃至历久不衰，能以教育当代以至若干世代的少年儿童，在于对生活的高度艺术概括，在于人物形象深刻的思想内涵和艺术魅力。

有的作家提出，不要排斥对孩子的教育中有所超脱的东西；还希望出版一些政治性、阶级性不那么外露的作品。这

种过去被视为修正主义异端邪说的见解，我觉得在探讨儿童文学社会功能问题时，值得冷静思考。这并非不要政治性、阶级性，而是要求儿童文学具有完美的艺术性，使政治性、阶级性“隐蔽”其中。这一点，儿童文学不但同一般成人文学相一致，甚至可说比成人文学更有此需要。至于对孩子的教育中容许“超脱”的问题，不仅与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有关，也与儿童文学的特点有关。我看完全可以允许某些超乎阶级内容之外的儿童生活内容、儿童生活情趣在创作中存在，如其然，《米什加烧粥》之类的作品，也可以不必怀疑其价值了。

主张对儿童文学的社会功能理解上要宽，就是说，在儿童文学小百花园里，既可以有“急功近利”、“立竿见影”的作品；也可以有教育作用不明显但对陶冶滋润孩子性情、愉悦孩子身心的有益的作品；当然更需要努力创作出具有很强的思想性和艺术性，因高度概括生活而社会教育作用深远的作品。惟其对儿童文学社会功能的理解宽了，创作思想才有可能从以往越走越窄的旧轨道上解放出来。

儿童文学创作中的现实主义问题

“四人帮”曾经声言“要摈弃任何一种所谓现实主义”，一切面向生活、忠于生活的作品，一时间都失去了生存的权利，儿童文学也不能幸免。《小兵张嘎》写了小嘎子打架咬人、堵烟囱，这些充分体现了生活和人物性格的现实性、丰

富性的情节，一概被斥为“故意让主人公犯错误”，“在人物脸上抹黑”，违反了小英雄必须“高大完美”的原则而罪莫大焉。“四人帮”作恶时期的儿童文学，已根本没有现实主义可言。

“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由于“左”的影响，儿童文学创作中背离生活、粉饰生活的违反现实主义的倾向已经滋长起来，这在整个文艺创作中是带有共性的问题。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比之成人文学，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更加不足，也可以说相当贫弱。——三十年过去了，作为结果，就是有重大影响、能够留传下来的儿童文学作品，较之成人文学是少得多了；在创作的成就上，两者的差距相当之大。现实主义在儿童文学中的这种特殊的不足，除了它的传统的不足（这又与我国儿童文学历史短有关）这个因素外，还另有原因。三十年来，儿童文学创作里有一种不成文的但却有着很大潜在影响的观点，即把儿童教育中的“正面教育”原则简单地直接引到儿童文学创作中来；把“正面教育”归结为只能写正面的、先进的、光明的事物，只能写没有缺点、没有错误的正面人物、英雄人物，因而导致儿童文学创作的脱离生活，把人物理想化，进而把孩子“神化”为“神童”。这种对于“正面教育”片面理解的观点，是和创作上抹煞真实性、粉饰生活的倾向一拍即合的，我以为这正是使现实主义特别难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立脚生根的一个原因。

多年来，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生活，往往要反复“过滤”到纯而又纯的程度之后，才能写给少年读者看。割裂生活，

在创作中用远非生活本来面貌的东西去“教育”少年儿童，这类教训过去我们是太多太多了。违背现实主义的创作倾向，使我们的儿童文学中产生了大量虚假的东西。它们只能给予孩子们不完全的、片面的甚至是被歪曲了的认识，很难说这倒是有利于少年儿童品性和才能的全面、健康的发展的。这样的作品，必然脱离它的反映对象，生活里的孩子是一回事，作品里的孩子又是一回事。也由于不真实，这样的作品又脱离了它的服务对象，小读者们感到作品里写的并不是生活里的事，人物也不象生活里的样子；只能落个“假的，没劲！”的批评，要使小读者读而能够终卷，信服而接受教育，是难乎其难的。

严文井同志不久前在一次座谈会的书面发言中说：“要说真话。要说孩子们听得懂的话。我们必须诚实，用孩子们相信的事实向孩子们进行教育。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站在孩子们当中，并取得他们的信任。”（引自《儿童文学研究》第四辑）这种不无沉痛之感的由衷之言，可以看作是儿童文学创作经历了三十年的成功与失败、胜利与挫折之后的经验之谈。当然，真实性并不就是一切，但就儿童文学创作根深蒂固存在的问题而论，这应该说是一个亟待确认的重要基点，舍此是谈不上儿童文学创作的真正繁荣兴旺的。

一九八〇年三月
〔原载《文艺报》〕

儿童文学创作要有大的突破

近年来，我国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正以前所未有的使人鼓舞的势头破浪突进，然而儿童文学却似乎是“僻处一隅”，还显得不那么活跃，正如有的同志所说：“儿童文学领域中那种过于平静的状态，反而是叫人担心的。”

粉碎“四人帮”后，儿童文学界批判了从路线出发、“三突出”之类荒谬的文艺帮规对儿童文学的戕害，开始打破了“四人帮”禁锢儿童文学创作的思想樊笼，儿童文学从濒于消亡中恢复了生机，创作队伍里出现了一批新作者，创作上出现了一批较好的作品，广大少年儿童的精神食粮有所丰富。可是，我以为，在儿童文学领域内，对林彪、“四人帮”一伙流毒的清算，对过去泛滥了许多年的“左”的倾向的探究，浅尝辄止，创作上则满足于恢复，这种精神状态，是确实存在的。我以为，缺乏积极进取的革新精神，很难为儿童文学带来繁荣。

以创作而论，去年以来，儿童文学短篇小说虽然出现了一批新人新作，童话创作也比较活跃，这是可喜的现象。然

而我感到，儿童文学创作的发展是比较迟缓的。例如一九七八、一九七九年两次对首先脱颖而出、起了报春作用的优秀短篇小说的全国评奖，其中没有一篇儿童小说获奖。去年举行的二十五年来全国的少年儿童文艺创作评奖，一等奖绝大多数是五十年代的作品，近三年来的一篇也未能入选。去年以来，成人文学中的中篇创作异军崛起，反响强烈的佳作竞相问世；这两年，儿童文学中长篇小说出版的数量可谓不少，但影响较大、受到孩子们和文学界热烈欢迎的作品，却不容易举得出来。

当前儿童文学发展不够快，原因在哪里？这里，我想从一部作品、一篇评论谈起。

在前年出版的多种儿童小说中，有一部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的邱勋同志的长篇《山高水长》。过去我曾经读过同一作者写于五十年代末的儿童中篇小说《微山湖上》，及此后写的儿童散文《采访》等，那诱人的儿童情趣，朴素、明朗、活泼的文笔，作者那为少年儿童写作的纯真热诚，和真实而又生动地表现生活的艺术才能，给我留下了颇深的印象。可是，这部《山高水长》却使我感到失望，作者固有的笔调看不到了，小读者喜闻乐见的儿童文学特点也所剩无几了；尤其是，小说对主要英雄人物作了远离生活的虚假雕琢和涂饰。当然，小说也并非一无可取，一些次要人物和一些生活侧面的表现，有不少来自生活的东西，艺术技巧也有其娴熟之处。从作品写作的时间看（小说的写作始于一九七四年，完成于一九七八年），也有可谅解的地方。但是，对于这部小说，我们

不能不认真地看作是作者创作上的一个退步。从《微山湖上》到《山高水长》，其间是有经验教训可以汲取的。如果有评论者写出文章来，实事求是地分析，这无论对作者，对儿童文学创作的除旧布新，都将会是有益的。

我终于读到了一篇关于《山高水长》的长篇评论：《试谈〈山高水长〉的人物和语言》（作者赵耀堂、肖甦，见一九八〇年三月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第三辑）。评论者对《山高水长》的若干可取之处不乏细致的分析，但，使人惊讶的是，对小说的失败处不但不以为非，反以为是，文章盛赞《山高水长》是“一首深沉的政治抒情诗”，认为作者通过这部小说“保留、发展和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等等。

依我看，《山高水长》的不真实之处主要正表现在所谓“政治抒情”方面。在塑造英雄形象的“高大完美”和英雄性格的“光彩夺目”上，作者无能为力但又要勉强为之，于是转而求助于外加的矫作的歌颂，也即“政治抒情”。对主要人物的歌颂不必说了，即以对一个“陪衬”的小英雄留孩的歌颂为例便可见一斑：一个仅仅九岁的儿童留孩在斗争中居然有了入党的想头，之后，试看小说是怎样“抒情”的吧：“（留孩的）声音在寂静的空气里轻轻震荡，经久不息。它就象柳泉的流水，穿过石缝岩洞、冰层雪堆，跌落在晶莹光洁的鹅卵石上，叮咚叮咚，叮咚叮咚，是那么清澈明净，坚韧不拔……”请恕我引用恩格斯在批评“真正的社会主义”文学倾向时说的一句尖刻的话：“谁要是有福受到这样的歌颂，那真是死也瞑目了。”不用说，这样的“政治抒情”，不论是怎样的“千回百转”“金

声玉震”，不仅徒劳，而且效果适得其反，人们只觉其假而决不可能信其真。

如此明显的缺乏历史的具体性，又缺乏生活的真实感，可是上述的那篇评论却大加赞赏。我想，倘若《山高水长》的作者对自己的创作深信不疑，而且全盘接受评论者的鼓励，一味去“发展”、“形成”那“政治抒情诗”的风格，那是非要在创作的歧路上越走越远不可的。

当前儿童文学之所以未能实现大的突破与创新，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不过我觉得，我们的儿童文学虽然走出了林彪、“四人帮”一伙引入的死胡同，可是并未完全摆脱“左”的影响，也就是说，我们在儿童文学中对于“左”的东西还“破”得不够。仿佛是一个一度几濒于死的孩子，一旦复苏了，却缺乏能使肌体健康发育的强壮剂，它当然不可能彻底驱除病毒而出现健壮的新生体，它当然只能瘦小、孱弱……

我国的儿童文学在五十年代曾经有过趋势良好的初步繁荣。从《罗文应的故事》、《五彩路》、《小黑马的故事》到《小兵张嘎》，特别是具有“嘎”这个性格特点的小嘎子的形象塑造，它所表现出来的生活的丰富性和人物性格的现实性十分可贵，标志着现实主义在儿童文学创作中的显著发展。可惜的是，五十年代儿童文学的顺境为时并不长，多少年来，在文学上和教育上双重的“左”的桎梏下，儿童文学创作上的虚假、脱离生活、背离现实主义等等现象，更甚于成人文学。三年多来，这种状况虽有不少变化，但还没有根本改观。一些在一般文艺创作中已遭到唾弃的清规戒律，在儿童

文学领域内仍在创作中起作用，理论上远没有廓清，以致出现对一些束缚儿童文学创作发展的传统观念以及明显的“左”的观点习焉不察甚至甘之如饴的状况。十七年间的儿童文学，我们曾慨叹于“先天不足，后天失调”；今天这种“破”之不足，“立”而未稳，又使人不得不发出相似的感受了。

一个时期内未见有影响的作品出世，乃至一部小说的失败，一篇评论的失当，这些，原是属于创作探索、理论研究范围内十分平常的事，本不足怪。问题在于，这是儿童文学这个“僻处一隅”“过于平静”的“典型环境”里的产物，它也就具有了不寻常的“典型”意义。我以为，我们的儿童文学在“左”的长期侵蚀中积非成是而且习以为常的局面，是到了非打破不可的时候了。不寻求突破与创新，我们的儿童文学就很难赶上成人文学迅猛发展的潮头，也决不能达到茅盾同志所期望的那样，在世界儿童文学中占一席之地。

一九八〇年六月

【原载《人民日报》】

论辩品格、“左”的影响及其他

——再评赵耀堂、肖甦同志的评论

一九八〇年春夏之间，有感于儿童文学界的思想解放还有待于继续促进，我不揣谫陋写了两篇短文，就前几年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状况谈了一点看法，其中之一题为《儿童文学创作要有大的突破》，文中曾对赵耀堂、肖甦同志关于小说《山高水长》的长篇评论中的若干观点，提出一些异议。（赵、肖两同志的文章见于《儿童文学研究》第三辑，题目是：《试谈〈山高水长〉的人物和语言》。）最近出版的《儿童文学研究》第八辑发表了赵、肖两位的又一篇长文《浅谈邱勋儿童文学创作的艺术特色》，此文有一条长长的“尾巴”，是对我的批评的反批评。对他们的反批评，本来也可以置而不论，但他们的这篇文章，又引起我对儿童文学评论如何继续肃清“左”的影响和提高评论质量问题的思考，谨再述浅见，就正于赵、肖二位之前。

一

赵、肖两同志的这篇文章对我的反批评，大别之，其一

是指责我对一部“较成功之作”的“难免败笔之处”大惊小怪；其二是批评我不该因一位作家写了“差一些”的“不如以前的作品”，就指摘他“走上创作的歧路”；其三是责难我“仅以艺术风格和笔调的变化，作为批评作家及其作品的优劣根据”。总之，是批评我对长篇小说《山高水长》“缺乏实事求是的分析”，是“不科学”的批评。

在这样的驳论面前，我感到困惑了。因为，我对《山高水长》和赵、肖二位对这部小说评论的批评，是有大前提和基本观点的：我是把《山高水长》及赵、肖的评论，作为儿童文学中“左”的影响未完全肃清的一种例证提出的。而赵、肖二位的反批评为什么偏偏隐讳了、回避了这一点呢？大惑不解之余，我再一次读了他们二位前后发表的两篇文章，才略有所悟：为对付论辩，赵、肖二位颇费了一番心机呵。

他们的这一篇文章有如下一段话：

“我们……这篇评论（指前一篇文章）在重点分析了《山高水长》的成就的同时，也在文章的最后一段严肃地指出了它的不足，甚至是败笔之处。……我们还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指出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作者受前些年林彪、江青一伙鼓吹的‘三突出’以及文艺创作中极左思潮的影响。”

这段话，于我颇为陌生，我十分不满意于自己的粗心了：为了写批评，我曾经仔细研读过赵、肖二位的前一篇文章，为什么对他们这样重要的观点和告白视而不见？可是，一经核查，不对了，关于《山高水长》的不足，赵、肖的前一篇文章末段轻描淡写地捎带一笔是有的，“严肃指出”则无。